

贈閱

民主論壇

第一卷 第八期

這一週

編輯室

杜魯門主義與門羅主義

王鐵崖

勸政府

錢實甫

論物價問題

沈毅昌

也談

鄒文海

從歷

之前途

徐鑄

不許日人重到台灣(下)

憶琴

(台灣通信)

民主政治與集權行政

章元鳳

中國也逞捭闔縱橫之術？林學洪

• 逢星期六出版 • 每二千元 •

民主論壇

WORLDWIDE DISTRIBUTION

這一週

「內戰」接近尾聲

上月杪，國民黨中央連日會議頻繁，到了三十日中央常會中央政治會舉行聯席會議後，國內局勢為之澄清。這一次會議決定三點：(一)加強剿共軍事，(二)集中黨和團的力量，(三)依照憲法實施準備程序辦理選舉。

其中第一點尤堪注意：現在中央已經認定中共的戰爭已經不是「內戰」性質，所以決定發表題為「掃除統一障礙，奠定建國基礎」的文告，針對中共的叛亂行為，向國內外做鄭重的聲明。旬日以來各方盛傳的討伐令雖然不至於就下，但是中央這種法律舉動，其意義和下討伐令實在沒有什麼兩樣。最高法院下令通緝毛澤東；最近政府某要人也說「今後將對共軍真正作戰」；從種種方面看來，時局確實已有重大的變化。頒佈文告的作用自然也不限於軍事上的振作士氣一端而止。兩年來國共雙方在國際勢力的微妙關係下，一面雖然進行着慘烈的武裝衝突，一面却也一直沒有放棄討伐還債的政治解決的希望，至少在表面上裝做是這樣。國大的召集，政府的改組，政府對於中共民盟都還「虛位以待」，這時的戰爭無論在法律上在事實上都是「內戰」，不過，這種局面將因政府頒發討伐令或類似性質的文告而告一結束，剩下的就只有內亂了。

日本人捕鯨又探磷

在麥克阿瑟的縱容之下，日本人一次二次的往南極捕鯨，這一次麥帥又決定准許日本人在太平洋安戈亞島開採磷礦；英澳紐西蘭諸國雖然都爲了麥帥這種片面的行動，抗議的抗議，反對的反對，但是一意孤行的還是一意孤行。自從盟軍佔領日本以後，美國借各種藉口，對日本曲予迴護，直是無微不至，麥帥極力主張減輕日本戰害賠償，許其維持較高的生產水準，擴充日本漁權範圍，保護日本顯然超過需要的紡織工業，恢復其縱橫遠東市場的對外貿易；最近更要求凍凍日本封存黃金以增強日本的經濟地位

• 主 論 •

，這一切都足以使得日本狂妄的野心再度擡起。太平洋沿岸各國對於美國這種有意扶植日本的危險政策，時刻增加不安和不滿的心理；澳洲外長伊瓦特上週向盟軍總部申明「澳洲反對日本戰爭工業之恢復」，他說「所有各國，尤其太平洋有關各國，應擁護澳洲所採之立場」；就是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對於麥帥的一味姑息寬容也都表示不滿，對於麥帥的「精神革命」尤深致懷疑。貝文最近官在外交辯論會中宣稱「日本事情之進行，無一出於英國所欲實現者」。在上一戰中，我國創鉅而痛深，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將爲我國生存上的直接威脅，對於現行管制日本政策的種種危險錯誤，似乎不宜獨持緘默，應當起而有所主張。

物價：管了還是漲，不管更漲

旬日以來物價高峯層出不窮，白米門市衝出五十萬大關，廠絲逾越三千三百萬，四十二支細紗迫近二千萬，龍頭細布漲至四十四萬多，水紗股票一度突破萬元，其他生絲呢絨香煙棉帛也都一致挺升，證券幫的貼息高達四角以上，這種緊張局面確是二月金鈔風潮發生以來所僅見；在內戰沒有停止，交通沒有恢復，通貨沒有收縮，物資沒有充沛，游資沒有正當出路以前，物價週期性的波動固然無法根本抑止，但是今日的物價，政府管制了還是要漲，假如不管制那就更要漲得利害。過去政府所採取的經濟監察和物價管制辦法，固然不能完全消滅囤積居奇的行爲，但是這些辦法在片面而不澈底，粗陋而不嚴密，假如連這一點約束都丟掉，結果不過替少數投機商人開財源，使一般消費者遭殃。白米漲價因爲米商一陣示威而宣告取消後，不消一會工夫米價便升至一倍以上，這一次熱症再發，一氣衝出了五十萬大關，紡管會撤銷了，紡織事業調節會代之而起，以調節代替管制據說產銷雙方可以交蒙其利，但是結果怎樣？漲勢之猛竟使紗商公會也都覺得過意不去，而向同業提出警告。事先不能嚴密防制，等到物價已經瘋狂上漲之後才來一陣手忙腳亂的應付，這正是過去政府物價政策的第一受病處。經濟監察團的存在固然引起工商界的不安和不便，但是該團結束以後，一般手握重資者的答覆又如何？在物價漲聲中，要在三角暗息之外賺取利潤簡直不容易，這是商人的痛苦！但是對於一般的消費者這却是個死活問題，眼睜睜的看著本已可憐的購買力化爲烏有！

杜魯門主義與門羅主義

王鐵崖

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政治，複雜異常而且動盪不定的國際政治之中，具有影響與支配的力量者是美蘇兩國。美蘇兩國均有其各別的主義，在一方面她們以其不同的主義為其國家政策的根據，也為其國家政策的特點，在另一方面，不同的主義也因為有這兩個國家的力量做推行的發動而得到發展的機會。蘇聯所代表的是共產主義，美國所代表的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自從在俄國成功之後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在此三十年之中，共產主義的具體實現自有若干的變化。資本主義歷史更長，且其本身本來是空泛而不具體的，而在近來的國際政治之中，澈底保留和支持資本主義者是美國，美國所給予資本主義的具體表現，則是最近為衆所週知即所謂杜魯門主義。

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是杜魯門主義。但是，因為美國在目前的國際政治處於極重要的地位，杜魯門主義對於目前的國際政治所發生的影響也是非常廣泛深遠，如果要對於整個杜魯門主義加以討論，則其所牽涉的範圍必定是太廣。四月五日杜魯門總統在民主黨午餐會上發表一篇演說，這是自他發表援助希土的演說之後一篇演說。在這一篇演說裏他說了一句話：他的外交政策「乃是門羅主義的引伸」。所謂他的外交政策，當然是最近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指杜魯門主義。據我們所知，這是第一次把杜魯門主義和門羅主義連在一起，而且杜魯門自己說這句話更增加其重要性。對於這句話，我們覺得一般人或且會發生嗟異：為什麼杜魯門主義是門羅主義的引伸？因此，我們就在這裏把杜魯門主義和門羅主義作一個簡單比較的研究，發現其異同，也許會幫助我們推測杜魯門主義將來的命運。

一、門羅主義的背景

在比較杜魯門主義與門羅主義之前，我們先要略說門羅主義成立的背

景，因為杜魯門主義的大概情形已經是盡人皆知，而門羅主義則已有一百二十餘年的歷史。

一般美國人都認為門羅主義是美國立國初期的環境所自然產生的結果。美國立國之初，其政治家已經定下了孤立的政策，也就是摻入歐洲政治漩渦的政策。因為美國初生，國力薄弱，而美國的民主制度還可以說在試驗的時期之中，如果參加歐洲的複雜政治局面，則一定是有害無利。同時，以美國的地理地位說來，美國與歐洲之間隔着一個廣大的海洋，也未有種種的情勢迫使美國非參加歐洲政治不可，這是消極的方面。在積極的方面說，美國既然不願參加歐洲的政治，當然也不歡迎歐洲各國的勢力到美洲來，如果歐洲國家的勢力到美洲來，其結果不免影響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尤其是歐洲國家主要的都是專制的政府，他們的勢力如果伸入美洲，會動搖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基礎。因此，哲斐遜說過，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為排斥在美洲的歐洲勢力，也因此美國人早就抱着「美洲人的美洲」的理想。我們可以說，在門羅主義成立之前，門羅主義的觀念已經產生於美國政治界。

門羅主義產生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歐洲的神聖同盟對於南美發生威脅，其二，俄國對於美洲西北部的土地具有佔取的野心。歐洲自拿破崙戰爭之後，情形相當不安定，尤以西班牙為甚，其王位被拿破崙所推翻，情形混亂，這給予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以解放的機會。拿破崙倒台，西班牙的國王恢復了王位，還想也恢復殖民地的主權，引起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在這時候，美國對於殖民地深表同情，美國政府且準備承認南美殖民地的獨立。在這時期之中，美國政府曾與西班牙交涉割讓 羅里打，條約已經簽字而未批准，而在這時候，俄國皇帝忽然發出一封諭令，羅里打，西北部海岸直至緯度五十一度屬於俄國，並且對於巴令海要行使獨佔的管

理。在美國看來，俄國對於這些地方的野心實給予美國以相當的威脅。

但是，最大的威脅則來自歐洲的神聖同盟、奧大利的梅特涅所發動與主持而俄普兩國參加的同盟。這些國家都是反動的，專制的，採取帝制政府的。她們主張正統的原則，她們主張神聖的權利，她們在國內維持帝制政府，在國外也要推行或恢復帝制政府，認爲是她們的責任。因此她們極力主張恢復拿破崙戰爭之前的原狀，讓各國國王恢復王位，恢復領土，其他國家是這樣，西班牙也是這樣。因此，神聖同盟不僅要恢復西班牙王位，並且要以同盟的力量干涉南美的革命，把南美殖民地恢復給西班牙。

在此情形之下，美國眼看俄國具有領土的野心，更感受神聖同盟的威脅，但是，好在神聖同盟對於美洲的威脅不是直接的，也不是立即發生的，尤其是舉足輕重的英國也因為政治原則以經濟利益的關係，已經表示與神聖同盟不能合作，美國便敢以新起國家的力量阻止歐洲的舊勢力。在美國看來，專制與民主是不可調和的，專制的勢力如果到了美洲，美國的民主就不能安全，繼南美西班牙殖民地之後，美國也可能成爲神聖同盟的犧牲品。英國與美國對於反對西班牙恢復其南美殖民地原具同感，英國曾經建議兩國作共同聯合的表示，但是因爲種種的原因，美國政府決定美國單獨表示。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美國總統門羅在其致國會的咨文裏，表示美國的意見，在咨文裏產生了舉世聞名的門羅主義，而這門羅主義也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則。

二、比較杜魯門主義與門羅主義

在咨文裏，關於所謂門羅主義實際上只有兩段，並且分放在兩處的兩段。一段是關於俄國對於美洲西北部的領土野心。門羅總統宣布美國與俄國之間，已經派代表交涉美洲西北部兩國各自的權利與利益。重要的一句話是：美洲已經維持自由獨立的狀況，從此之後不得被視爲任何歐洲國家將來殖民的對象。這是一個原則，而這個原則牽涉到美國的權利與利益。另一段，比較更重要的，是關於神聖同盟的威脅。門羅總統贊揚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最近的進步，表示美國人民的同情；接着，他則聲明，美國不參加歐洲的戰爭，而對於美洲則關係密切。重要的幾句話是：他認爲歐洲各國的政治體系與美國不同，美國必須防衛美國自己的體系，因此，美國對

於歐洲各國要想將她們的體系擴展到美洲的任何一部份來，都看做對於美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接着，他又認爲，美國不干涉歐洲各國在美洲現有的殖民地，但是，如果歐洲各國要干涉與抑制在美洲已經宣布獨立的國家，則美國看做對美國的不友誼的行動。這就是門羅主義當初的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一百二十餘年之後的杜魯門主義。所謂杜魯門主義是產生自本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對國會特別聯席會議所發表的演說。演說的目的在於要求國會制定援助希土兩國的法案。在演說裏，杜魯門總統首先說明，美國政府接得希臘政府要求給予財政經濟援助的緊急呼籲，希臘經濟情形惡劣，政治情形之混亂，尤其是武裝共產黨黨的威脅，欲使希臘繼續成爲自給自尊的民主國家，她必須得到外部的幫助，而英國已經表示不願再繼續援助，聯合國也不能給予其所需要的援助，因而只有美國能夠，也應該負擔這援助的責任。土耳其的情形也相彷彿，要維持中東秩序，土耳其必須維持其國家完整，土耳其的完整需要美國的物質的援助。

在杜魯門的演說之中重要的部份是援助希土說到杜魯門所主張的美國外交政策。他說，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目標是創設若干條件，在此種條件之下，美國及其他國家能夠「造一種免受壓迫的生活方式；要實以這樣的目的，美國必須協助自由的人民維持其政府及國家完整，并反對任何助長獨裁政權的侵犯性運動，這也是說，加諸自由人民的獨裁政權，無論其爲直接或間接侵略，均足以貽害國際和平及美國的安全。他認爲，目前世界之中，國家的生活方式有二種，一是自由，另一則是壓制。美國的政策是支持自由以抵抗壓制的企圖，自由制度的摧毀將危害整個世界。在演說的最末一段，杜魯門總統加重的說：「世界各地自由民族，均期望吾人的支持，以維持他們的自由，吾人如果畏縮不前，則吾人可能危害世界的和平，而必然危及吾人本身的福利。」

三、同異之處何在

我們把門羅總統的咨文和杜魯門的演說來相比較，我們當然會發現，無論在形式上抑在實質上，都有不同的地方。在形式上，例如，門羅總統是在對國會的通常咨文裏提出美國對於當前問題的主張，杜魯門總統是對

國會所特別召集的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專討論美國應付當前局勢的政策。又例如，門羅總統只宣布主張，杜魯門則要求國會立法行動；再例如，門羅總統宣布主張，只簡單的提出，杜魯門總統則長篇大論說明當前的局勢并具體的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重要的自然是實質上的差別。門羅主義的功用在於消極的對歐洲的國家插足在美國的範圍，拒絕專制勢力的伸入，而杜魯門主義則積極的援助所謂自由受威脅的希土兩國，以物質的援助支持美國所認為應該維持存在的政府，此其一。門羅主義所對抗的對象是專制主義的神聖同盟，而杜魯門主義所對抗的對象則是獨裁政權的侵犯性運動，也就是壓迫自由的共產主義，此其二。門羅主義適用的範圍限於美洲，美洲土地不得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美洲人民不得受歐洲勢力的侵擾，而杜魯門主義適用的範圍并無限制，全世界各地的自由民族都期望美國的支持，美國也都有支持的責任，此其三。從這些方面說來，我們似乎很難想像門羅主義和杜魯門主義怎樣連在一起。我們一說到門羅主義，就會想到「美洲的美洲」，或「美國的美洲」以及美國的孤立主義，或且美歐兩洲互不干涉等等。說到杜魯門主義，則我們看到其所表現的是美國的干涉歐洲政治，美國的勢力向世界各地伸張，她要做到領導世界或且支配世界的地位。與其說門羅主義與杜魯門主義有什麼關係，還不如說後者破壞了前者。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我們也會發現門羅主義和杜魯門主義也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許多偶然的相同的地方固然沒有什麼意義，例如，門羅主義的對象包括牽制的俄國，而杜魯門主義所謂獨裁政權指的是共產主義，也就指着共產主義的蘇俄；門羅主義預先等着英國的支持，杜魯門主義也可以說先得了英國方面的諒解。除了這些偶然的相同之外，其主要的相同之點則在於：第一，美國要負領導的責任，在十九世紀初葉，國力尚未強大之時只要領導美洲，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國力已經超過任何國家之上，則要領導全世界。第二，無論門羅主義抑杜魯門主義，都以美國的安全與權利為理由。在過去，歐洲國家的勢力如果伸入美洲，美國的權利與利益就要受妨害，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就要受威脅；在現在，如果希土兩國以及其他各地的民族不能免受壓迫，則美國的安全就要受損害，美國本身的福利也有危險。第三，門羅主義所抵抗的是專制的原則，是歐洲的

舊政治體系，杜魯門主義則要阻止極權政治的擴張，是獨裁的原則，兩者似乎不同，而在杜魯門看來是一樣的，都是壓迫自由與企圖征服，而且無論門羅主義與杜魯門主義都是為着要維護美國的民主制度與自由主義，而這民主制度與自由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具有絕對的價值的。

四、杜魯門主義是門羅主義的引伸

如果杜魯門主義和門羅主義的確有其相同之點，而且在現在看其相同之點較其不同之點更為重要，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杜魯門主義是門羅主義的引伸呢？杜魯門總統在四月五日的演說所說他的政策是門羅主義的引伸，當然可能是為其政策辯護，為其政策找有力的根據，誠如美國一個學者說過，任何美國總統採取任何政策，都喜歡說牠是門羅主義，因為門羅主義既是美國外交的傳統，又是全美國人民所毫無問題贊成的，戴上門羅主義的帽子，任何政策都容易受歡迎。并且，門羅主義本來沒有一定的定義，也沒有一定的範圍，在一百二十餘年之中，門羅主義發生許多的變化，繼續不斷在發展擴張，任何主張與政策都是門羅主義，大羅斯福的世界政策以及威爾遜的國際主義既然是門羅主義，杜魯門的新政策何嘗不可以也歸在門羅主義之下。

杜魯門說他的政策是門羅主義的引伸，他本身未加以解釋。如果我們參照杜魯門主義與門羅主義的相同之點，我們也許可以說杜魯門總統認為，他在他的新政策之中，把（一）美國領導美洲的責任推廣到領導世界的責任，（二）美國的安全和權利從以美洲為基礎變成以全世界為基礎，（三）目前的共產主義認為就是極權政治，而極權政治也就是專制政府的延續。根本的目的是一樣的，即領導責任，美國的安全與權利，反抗專制以維護自由，而情勢的不同使門羅主義擴充成為杜魯門主義，也就是說門羅主義引伸到杜魯門主義。

將門羅主義與杜魯門主義比較來說明杜魯門主義是門羅主義的引伸，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杜魯門主義的前途。我們在今天還未能詳細討論杜魯門主義的各方面的意義，因為牠還在發展的階段。為着國際和平與安全，一般開明的人士都在憂慮杜魯門主義走上極端的路線。事實上，國際

的情勢和美國國內的局面是否允許美國不顧一切的爭取領導的地位？美國應否把她所謂國家的安全與權利放在世界任何一角落？同時，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否具有絕對的價值，而共產主義是否就是極權政治，是否也就是專制政府的延續？這些都是問題。更有問題的，杜魯門主義與其說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是否反而促成國際的衝突？當然，杜魯門主義即使在名

勸政府

錢實甫

義上成立，還可能發生變化。如果係門羅主義一樣從大羅斯福的鞭策政策變為小羅斯福的善隣政策，杜魯門主義能從勢力擴充政策變為國際合作政策，這則是我們所歡迎的。

六月十六日北大宿舍

春秋責備賢者

• 論 主 氏 •

中國過去有一個議論或批評人的原則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死者諱。這是出於一貫的「隱惡揚善」的道德教條，原也未可厚非；但只因這一個「諱」字，於是一切的本紀、列傳以迄壽序、墓誌銘之類，都成了歌誦阿諛的文獻，在誇大好與消滅壞的筆底，整個的歷史也染遍了矯揉造作的粉飾文章。另一方面，號稱義正辭嚴的春秋章法，對於那般亂臣賊子則又不惜盡量的口誅筆伐，使那般惡賊的罪狀醜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這種態度原也不錯，只可惜誅伐太甚，成為誇大壞與消滅好的片面紀錄，反使真相不易正對世人。由於這種作風，堯舜的好與桀紂的壞，都在不斷的由製造添點而累積，正確的史實便塗滿了歪曲的渲染，又豈是一種正當的態度？幸好「春秋精神」中另有一種優良的作風——「責備賢者」，對於那般好人反而要更進一層去責備求全，對於壞人則不屑苛求。古時的賢者往往便是尊者，因而所謂好人，其真義不如說是「要人」，而不一定就是「善人」。這般要人，其一舉一動的關係極其重大，雖不如人民的理想，却也沒有壞到完全失望的程度，世人還相當的看得起他們，因而乃寄以最大的希望，提出種種的要求。至於對待那般已被厭棄了的壞蛋，希望既失，責備亦無了。總之，這種態度的基點是：對於那些關係極大而利害極

重要的要人們，希望最嚴而責備最嚴，同時也就是愛護最深而期許較切的意見。這正如俗話所說的「看你不起，打架不成」的道理一般。

古代的賢明統治者，對於人民由這樣的心理與態度所表現的不滿，所流露的批評，所提出的要求等，充分明白這乃是毫無惡意而絕無危險的，因而便不但不以為侮，且以為榮，更以為戒。他們最怕的，却是人民的冷淡；更恐懼人民只是搖頭太息的不肯說話，迫得無可奈何時也只有一句「夫復何言」的回答。所謂善言忠告，其實也就是一些不很好聽的惡話；賢明的統治則不覺其刺耳，而願虛心接納。禹聞善言則拜，便是向那說壞話的人作揖打拱，多謝那些罵他的人。因為所謂賢明，並不一定就全無過失，只是賢於納諫，明於改過而已。我們看：以唐太宗那樣一位帝王，真可以比美想像中的堯舜，但魏徵之流的大臣還在不斷的予以責備，當着百官，不惜面折廷爭，全不給皇帝留點兒面子，時常在耳提面命，像教訓大兒子的反覆開導。李世民的偉大在此，貞觀之治的來由也在此。反之，到了人民對於統治者失望的時候，他們到不會再說甚麼了，滿腔的憤怒，只是蘊藏起來，不敢也不肯輕發；一直要累積到忍無可忍時才會爆發，這一發便已不可收拾。那時人民口中的話，就只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類的革命誓詞了。

我們本於這一原則，向政府略略貢獻一些粗鄙的意見，雖不敢說便是絕對正確而可貴，但至少是「旁觀者清」，多少總可以值得參考。尤其是

動機的清潔，態度的光明，意思的誠懇，期望的殷切，應該能獲政府的諒解。所可惜的，是政府中人常屬神經過敏，動輒疑到凡話必有背景、作用、陰謀，而把好話，也當成惡話，大肆猜忌。以致只見一般毫無骨頭的人，在那裏說些甚麼「天子聖明兮，臣罪當誅」的鬼話。我們從來不打算依附誰來有所貪圖，當然不屑於「逢君之惡」，只能說些最老實的話來奉勸政府。根本上，則是愛護政府的；否則，政府愈壞愈妙，垮台愈快而開心愈早，又何心多此一說，自討麻煩？

我們不敢說真是「肉食者鄙」，但却深信「旁觀者清」的道理，尤其反對堅持「庶人不議」的態度。因此，首先便奉勸政府「廣開言路，博採輿情」；切莫再扣留書刊，封閉報館，檢查新聞，逮捕記者，自己培養反對政府的實力。

威而不信

一個政府必須樹立威信，自不待言。就我們的看法，現在的政府的確是威而不信的，可以說，威則有之，信則未必。這乃是政府應該首先痛切反省而澈底改善的一個前提。

任何一個政府，有信則必有威，有威却不一定便有信，可見信重於威。信從何來？別無他途，全在政府本身的表现是否博得人民的愛戴與擁護，而樹立堅強的信心。人民對於政府的反應，可能產生誤會，把有意當成惡意；但這種不幸的誤會只可能發生於一部分的人，也只可能存在於一時一事，斷不足以造成人民對政府的永久而普遍的失信。衆人誠然是難與慮始的，政府明白此點，就應一方面盡量忍耐着人民的責難，一方面又不斷的循循善誘去詳為解釋，同時更要拿出確實的結果來兌現，使人民無話可說。這樣做得幾回，再冥頑不靈的衆人也會變得可與慮始，對政府是信而不疑了。

我們的政府失信於人民的事，說來實在太多，却都是政府自取的，並非由於人民的好疑成性。比如有關保護人民各種自由的法令、諾言、保證以及不斷的「重申」，往往話猶在耳，事已不經。尤其黃金儲蓄的大折扣，在政府所得無多，却使人民對政府的信用喪盡。這種爲智者之所不爲

的蠢事，偏有那般糊塗的高官，大打其得不償失的小算盤，自己失信於人。只看美金公債的難於推銷，即可反應人民對政府的放心不下。至於國民黨中全會所決議的沒收豪門資本與嚴懲貪污等大案，人民即在失望之餘，又何嘗不在嗚呼與期待着；不幸終歸於無而無行，永無下落。如此，再想博得人民的正視，也將難乎其難。然而在另一方面，凡屬政府施威的事，則莫不真正做到「言出法隨」，既迅速得驚人，且實行起來往往徹底得過分。比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既可不經立法程序，又可只憑報紙的刊載，不需正式公文的傳達便已生效。但每次調整待遇的決定雖已早成事實，却非等到正式公文的遲遲到來，決不肯早發一天。在這些情形對比之下，誰不起疑心，誰不生反感？總之：政府對於有利的事莫不認真，而於無利的事則盡量拖延。這種政府已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其利害早與人民的利害分離，或更衝突，那又如何可得人民的信仰？政府只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只有義務而無權利，這種政府又何能獲得人民的擁護與愛戴？

我們說，政府在人民的反應中是威而不信的，原因便在政府的施威有餘，立信不足。如果再進一步，便到了威而無信的程度，政府也將危乎其危了。威的憑藉的強，方式是壓迫；過分的威便是暴與虐；我們從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暴虐的政府可以長存？自古道：國無信不立，政府也明白此點，經常在求威信的樹立，更常要求人民尊重政府的威信；可惜政府只知道施威，而不立信，自己離開去人民的擁戴。

至於政府本身的表现，也就够可憐了。每當一件稍較重大的事情發生，不是顯得手忙腳亂，便是弄得牛頭不對馬嘴；見笑大方，隱憂萬國。現在的政府是號稱法治的，人民固須守法，政府尤其應先守法，這種法才不是專門拿來壓迫百姓的酷法。何況直到現在爲止，制法的大權仍然操於政府之手，可見一切的法令都是於政府無礙的，則政府更應在他認爲可以遵照的範圍內去制法而守法。事實上却往往大謬不然。我們先說一件小事吧。政府曾有明令規定「民國」之上，必加「中華」；這本屬小事，却成了大事。不幸堂堂大典的張自忠將軍的榮哀狀上（見本年五月份中國生活第九期影印），便忘記這一明令，而只寫「於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張河陣亡」。這豈非自己打自己嘴巴？至於國民政府的組織法總要算是大事的，也弄得今天公布，明天修改，更鬧出人意外。這一法令是何等重要

的東西，事先何以不仔細考慮一番，便冒失公布，真令人百索不得其解。所謂「朝令夕改」，我們以前還只當是一個刻薄挖苦的形容詞而已，不圖今日真的見諸事實。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行為，人民又何能寄以信念？

我們再奉勸政府：威信自然是必要的，却要做到威而有信，威出於信。只是施威，決不足以立信；只是示威，更不足以取信。信重於威，政府必須首先有信，威自然而來。信是否可以建樹，則首先要看政府是否先自守法，以及如何的制法。若是威而有餘，信則未也，弄到威而無信的地步，則政府也就快到崩潰的地步了！

兩種政策

我們的國家的確是百孔千瘡的，自然難爲了政府，大有「扶得東來西又倒」之概。但我們要記得：現在的政府已經專政了二十年之久，儘管困難重重，也應該早已理出一個頭緒來了，至少也應該使人可能感到已有好的朕兆，才說得過去。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還可以坦白的說，不獨沒有好轉的模樣，而且是每况愈下。政府說然是有困難的，若加以警解，人民自可明白原諒，更可以因體諒而愈加愛護政府。比如說，二十年間不幸有不斷的內憂外患發生，妨礙了一切建設工作的實施，我們可以相信多少有些道理。但普遍存在的一個重大病根——貪污，却不能把罪名加在別人或老百姓的頭上。就憑政府自己來說，大小貪官污吏的產生與滋長，總不能怪日本人，怪共產黨吧。

然而政府却又是最講究面子的，決不肯認錯，更不會改過，只是在所謂威信上去用功夫。爲着要示威，便用「帽子政策」來嚇人，實行恐怖主義，盡量的壓迫；爲着要取信，便用「被糊政策」來哄人，實行粉飾主義，盡量的欺騙。這「帽子政策」與「被糊政策」，便是政府用來保持威信的兩件法寶，不幸這兩個法寶都只是以紙包火的魔術而已，話猶未完，手已灼傷，表演得十分的不精采。

這兩個辦法姑無論是否正當而合理，只就它的效果來說，也就太可憐

了。偶一用之，或許還不失爲一個應變的手段，不斷的使用，則反會害諸自己。帽子戴在別人的頭上，或可懲一警百，若全國人或大多數人都被戴上了帽子，則不戴帽子的人反而成了異樣的怪物，成爲十手所指的衆矢之的了。被糊專家的本領再高，在狂風暴雨的侵蝕之下，也將無所施其巧技，斷難掩飾百孔千瘡的遍體鱗傷。要使人民看不見政府的缺點，則最後只有出於被糊人民眼睛的一法。帽子戴在自己的頭上，被糊貼著人民的眼睛，即無異是自招罪狀而樹立明白的目標，使人盲動起來也不會失掉對象了。聰明的政府，往往糊塗一時，把自己送到那不可救藥的絕路上去。

最後我們更奉勸政府，不妨參攷參攷兩個聖人的哲言。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到了人民被壓榨得沒有生機時，恐怖也將無用。陳涉吳廣只說了一句「等死耳」，老百姓便揭竿而起，推翻了偉大的秦帝國。林肯說：「有時一切人民都可欺，也有些人民一切都可欺，但你決不能在一切時候欺騙一切人民」。欺騙手段的無用，正是如此。幽王焚火戲諸侯，到底還是自食其果。

這樣說了許多，似乎政府百無一是，非去不可。其實却也並不如何嚴重，從現在起痛下決心，改絃易轍，做幾件痛快的事給人民看看，還是大有爲的。政府的威實在已够，不必再求，主要的乃在立信。沒收一兩家專門的官僚資本，殺掉一兩個頭等的貪官污吏。讓人民隨便說幾句牢騷話，誰還再反對政府？

現在的政府確有一個重大的苦衷是我們應加原諒的，即它所接受的遺產實在太壞，殊非一時所能整頓。這是政府的特殊困難，不易收效更不易立功的。但就因爲如此，政府也同時揀得了莫大的便宜，很容易見好於人民。「饑者易爲食」，只要政府略予小惠，老百姓便會感恩不盡了。替政府設想，目前固屬是危機四伏，困難重重，然而究竟還不失爲「大有爲」的時代。我們並打算推翻政府，因就所知，說明如上。「君子愛人以德」，我們自付並非小人，因而不屑說那些政府所愛聽的話！

論物價問題

沈毅昌

一、內戰期間物價上漲原因之檢討

物資、生產之減少，與通貨、消費之增加，乃物價上漲之二大因素，而內戰的每一動作本身，往往同時兼含有這二種使物價上漲之因素，茲以徵兵及收購物資二件事情為例以說明其中狀況，假定我國平日有一百個農夫，有一百個兵士，內戰爆發後，政府（或是中國共產黨）爲了增加兵力起見，假定從一百個農夫中抽出二十個以充兵士，這時農夫剩下了八十個，這就是表示從事於生產的人數減少，同時兵士卻增加成一百二十個，這就是表示從事於消費的人數增加，同樣情形，再假定我國平日有一百件物資，一百元法幣，今政府（或中共）爲了補充內戰消耗起見，再發行二十元法幣以收購二十件物資，這時候物資剩下八十件，法幣却增加成一百二十元，以上二例物資，生產減少部份還沒有把內戰直接破壞的房屋、工廠、鐵路、交通、礦產、橋樑等項目估計在內這種因內戰而發生的一面物資，生產減少，一面通貨，消費增加是今日物價上漲最主要的根由，此外還有三個由此根由所產生的次要原因。

第一個是囤貨之普遍；人民在經驗中體悟到法幣購買力不斷地降低，就產生了「重物輕幣」的心理，於是一有法幣在手就立刻用以購買貨物，其中大部份固是柴、米、油、鹽、衣食等生活必需品，但藉此以保存自己財產價值也不少，因爲在物價繼續上漲過程中，財產若以法幣形態存在，則時間愈久，受損失愈大，所以這種爲了保存自己財產價值而從事於囤積的舉動，在道德上也未嘗會得說不過去，但是人人囤積一些貨物則集沙成塔，其數量當亦異常可觀，結果使市場上的物資愈益缺少，同時一有法幣在

手立刻用以購貨這種習慣使法幣流通速度大大地增加了，目前通貨量較之戰前祇增加了七千八百倍，而物價却增加至三萬倍左右，就是法幣流通速度加快之緣故。第二是通貨膨脹與財政赤字間循環式的擴大；當今國家因進行內戰而財政上發生困難之時，發行法幣，既不患應募之無人，又不支付何等利息，裨益於國庫良多，但多發行法幣則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則物價高漲，物價高漲則財政赤字愈益龐大，財政赤字愈益龐大則須發行法幣之數字愈大，如此循環不已，是以去年度預算爲二萬五千億元，雖其間出售黃金、外匯、徵借物資及美軍剩餘物資以資彌補，但決算爲六萬餘億元相差幾達三倍之多，同時這種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間的擴大循環，直接促物價上漲的幅度加闊，使物價上漲的趨勢益不可收拾。第三是搶米，劫車等社會變亂的氾濫；最近行政院院長張羣氏在就職的廣播詞中說「中國經過八年抗戰再加一年有餘的國內戰，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的危機一天一天的深刻化。」是的，這種危機深刻化到人民不能生活的那時候那裏人民祇得趨於「挺而走險」之途，所以近來各大都市搶米及各交通綫上劫車等事，時有所聞，商人們受了這種意外損失，必在物品中加價出售以資補償，即未受到損害者亦必在物品中加價以資保險。以上三種次要因素，是物價因生產，物資減少消費，通貨增加而上漲後所產生出來的，但這三種次要因素本身也促使物價更趨於上漲。

二、物價上漲後社會各階層所受之影響

各類物品間和消費者所得間如能作同樣程度上漲，則社會上各階層並沒有受到分配不公的不良影響，且有刺激國民經濟發展的功能；但是這種

太理想化的「均衡上漲論」是永遠不會變成事實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物價上漲的導火線不同，如前次物價波動的原因由於調整外匯，那麼與外匯直接有關係的黃金美鈔及進口貨物漲得最厲害，其他貨物僅受其刺激漲得較少，這次物價上漲由於政府在糧食產地收購軍米，故以米及其他農產漲得最多。第二假定各類物品間與人民所得間能夠均衡上漲那麼社會財富就不會流到政府手中去了，這就和政府實行通貨膨脹的目的互相矛盾。

均衡上漲既不可能，那麼社會財富之再分配也就不可避免的，在社會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得到利益的當然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因為他們無論在運輸上，貸款上，外匯上，都有種種特殊便利，而政治上的一切措施對策，都是以維護他們利益為最後依歸的。物價上漲對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常是有利的，因農產品之生產以一年為週期，缺乏伸縮性，農產品的上漲其長期趨勢是落後於一般物價的，至於這次糧價上漲也不一定對於農民有利；據說戰前安徽省每石米自原始市場運至蕪湖出售所有耗費達三十三種之多，經過了八年抗戰，二年內戰，交通、關卡、捐稅困難較之昔日為多，所以此次糧價上漲，得利的是中間商而不是農民，至於物價上漲對民族工業之摧殘也很值得注意，今略述如下：

(一) 社會財富經過再分配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這對於民族工業生產異常不利，譬如說一百個人各有一百元財富，如果此一百人各購襪子一雙，(假定全購國貨)則生產界可銷出襪一百雙，但當此一百人的財富集中於一人之手時，則此一人決不會同樣地去購買一百雙襪子，(二) 因幣值跌落而在帳簿上發現的利盈是虛的，但是政府所得稅，利得稅仍要根據此「虛盈」而抽的，這等於間接沒收資本，(三) 在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法幣的對內價值，低於對外價值，差不多已成為很自然的關係，因而過去政府為了鼓勵輸出起見會提高外匯，但不久國內物價上漲，出口無法進行，入超依然存在，據海關發表，去年全年進口淨值共計一萬五千〇一億六千五百二十四萬元，出口淨值為四千一百二十一億一千一百八十一萬元，進口淨值為出口淨值之三倍，這樣大量入超的存在，使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日趨狹窄，同時國外市場亦將完全喪失，如紐約馬錫公司遠東經理哈維所說，戰前由中國大量供應之製成品市場，已盡被他國攫取，波多

黎各、墨西哥、印度、瑞士、義大利均以中國式出品運銷美國，目前中國能出口之物品僅桐油、豬鬃數種而已。

三、物價問題之對策

物價問題之對策可分治本和治標二種，治本的就是停止內戰，此係老生常談，用不着再加以說明，不過停止內戰之可能性似乎很小，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記得在抗戰期間，強敵壓境，而國共之間猶有新四軍事件等糾紛發生，無怪乎勝利後和談終於談不好，最近參政會提出恢復和談的提案，當然最好能夠出現奇蹟地使內戰停止，因為內戰一停止，財政赤字可因軍費減少而減少，法幣亦可以緊縮發行，其他增加生產，恢復交通等事亦很容易着手，物價問題也就因此而澈底解決了。

至於治標方面可以分二點來說：(一) 政府此後對於財政赤字，不要再乞靈於印刷機，應從公債和租稅方面去想办法，最近發行之美金債券及短期庫券，推銷情形尚稱不壞，惟目前黑市利率甚高，大概在二角左右，故若能將美金債券及短期庫券之利率略予提高，則購買者當更形踴躍，戰後各國舉辦巨額內債以彌補財政赤字之先例很多，如英國至一九四六年共負內債二四六億餘磅，同年年底義大利大量發行長期公債，結果收入二千三百一十一億里拉。我國除了模仿外國舉辦內債以外，最好再徵收財產稅，可先從房屋財產稅，土地財產稅入手，因為土地房屋，當局已有相當統計資料，舉辦這等財產稅亦較容易。

(二) 目前的法幣已失去價值權度，財富儲藏，延期支付標準，種種功能，無論在財政立場上，國際貿易立場上，生產界立場上均有改革幣制之必要，依筆者之淺見，政府最好在五億美元貸款到手後即將其用作改革幣制之基金，同時發行新幣，此新幣一元等於今日法幣二萬元，至於新幣之外匯率不妨定為美元一元等於新幣二元，此時新幣之對內價值由短期庫券，財產稅維持，其對外價值則由五億美元貸款，美金公債維持，新幣之內價外價同時穩定後則今日財政上，國際貿易上，生產上，各種困難，將消失於無形，不亦善乎。

也談經濟問題

鄒文海

中國現在的情形，真是一「棄資源於無用，迫人民入水火」。這種情形的造成，大半固然由於內戰。兩方因戰爭而直接動員的人數，幾達八百萬人，而這八百萬人進行拉鋸的區域，又為一萬萬多人生息長養之地。每發一顆砲彈，固然要消耗不少人的血與汗，而每一顆砲彈的着落，更不知要犧牲多少人的性命與財產？不過內戰即使停止了，用現在生了鏽的機構以及貪污成習的公務員去建設經濟，恐怕也不會做出什麼成績。因為這個關係，談經濟建設的人，很容易發生三分經濟七分政治的感喟。這就是說不能肅清政治上腐化的風氣，連經濟建設都談不上的。

內亂與政治腐敗，這是經濟崩潰的主因，我們且不說這個，祇是就經濟論經濟的來談談復興工作所應該採取的步伐。

我們常常談經濟復興，但所謂經濟復興，不知究何所指？說明白一些，我們經濟復興的目標究竟如何，政府既未明白宣示，而在他所定的經濟緊急措置方案中，也不容易猜測他的意向。因之，經濟復興始終是紙上談兵，而從不能發生一絲一毫的實際成績。

我們要談經濟復興，最少應該知道抗戰以來經濟界的變動是什麼。這一點不能清楚，經濟復興就有無從下手之苦。從蘆溝橋事變開始，我們的生產量在加速度的萎縮中。農工兩業，因耕地的淪陷，工廠的毀損而無法維持原來的產量。以後敵人的足跡愈益深入，我們生產荒的程度亦愈益嚴重。從農業來說，在抗戰的末期，適宜於農作的地域，幾乎僅僅保留了個四川盆地，其餘的都是丘陵地山地和高原了。當然，那時沿海一帶的平原，依舊有人在那裏耕種，但敵人的搜括，使大家都無法溫飽。尤其農忙時節的役政，也使農民的勞力浪費了不少。最苦的要算內地，人口大量西遷的階段中，農民移動的數量極為有限。因之，「下江人」的糧食，實際要由內地人增產的結果來負擔。自由區域的土地都是這樣的貧瘠，在各種勞

力之下，增產的成績極屬有限。自由區域要發生糧荒，實為意想中事。抗戰勝利以後，這個問題應該很快就可恢復原狀。殊不知內戰又起，被犧牲的可耕地更多，糧食恐慌的程度反而較抗戰時間更為嚴重。說實在話，抗戰時期的沿海區域，尚能於日人壓迫之下苟安地從事農作。而內戰期中，拉鋸式反覆的爭奪，使波及地帶盡或荒蕪。從這一點來說，農業生產的萎縮，抗戰以後實愈甚於抗戰之時。

從工業來說，抗戰初起之時，手工業及小型工業甚至有特殊繁榮的趨勢。上海失守以後，我們機器工業的基礎十去其七。雖然政府搶運了一部分機器，並不足以適應開發內地的需要。可是當時人心振奮，而且需要變成了創造之母，所以在一羣人慘淡經營之下，植物油廠酒精燃料廠紙廠布廠以及其他工業，此興彼起，供應了戰時生活的需要。我們並不是說這時能做到自給自足的地步，但異常艱難的環境中能有這樣的成績，實亦差足自慰。足證當時一般人愛國的情緒極為熱烈，而苦幹實幹的精神更可感泣。不幸以後法幣不斷的跌價，物價因此一日數漲，經商的不敢買賣，工廠不能從事生產，大家祇好在投機與囤積中謀生，這個時期的小工業與小型工業就祇有停歇的份兒，而工業生產也就一落千丈。抗戰勝利以後，工業的重心回到東方。大家的希望是無窮盡的。日人在幾個工業區都有大量的建設，尤其台灣及東北，經營既久，規模亦相當宏大。這許多礦場和工廠的接收總可以救濟我們生產貧乏的恐慌了罷？但是東北初經蘇聯的掠奪，繼遭中共的破壞，最後又是接收人員鬧一點花樣，好好的工業區域，變得停工的停工，縮小規模的縮小規模。最近烽火遍地，索與迫得大家流亡還來不及，還談得到什麼生產？其餘的工業區域，台灣天津上海等等，在舞弊分贓中飽以及腐敗的管理之下，也完全變成被支解的形態。從此以後，生產與需求之間，隔開了不少的距離。

以上所說各節，證明生產的萎縮，這是抗戰以來經濟界第一個大變動。

其次，我們認為報酬標準的改變也是抗戰以來經濟界的大事。抗戰以來，政府一直採取不完全的統制政策。而這種不完全的統制政策，使不受他統制的都變成暴富者，而受他統制的又變成特別受損害的人。亦因為這個關係，報酬的標準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抗戰初起，物價沒有什麼大的波動，公教人員就規定祇發七折的薪水。以後不但折扣，而且有了加成，而公教人員的生活，反步步走入難關，因為加成的倍數，根本不依據生活的指數。公教人員的實際薪金，沒有不是每年降低的。其次受政府統制的是農民。戰爭初起，糧價稍稍上漲，而且上漲的程度，較其他物價為速，這時期的農民，反較戰前優裕。後來因為糧價影響軍食，政府不得不嚴厲管制，始而平價，繼而徵穀，使一度繁榮的農村，又因穀賤傷農而大受打擊。從徵的辦法開始，一直到此次發生，白色恐慌以前，米價事實上總是落在其他物價之後。這一種政策，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不得不逐漸降低其生活標準。最可怕的是士兵的待遇，戰前即以月餉四元計算，按現在的生活指數也應該有十萬元一月，而事實上他們在最近調整待遇以後所得到的餉額還不到三萬元。我們約略估計，士兵的收入，約及戰前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農民的收入約及戰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公教人員的收入約及戰前的百分之四十。這三種人，都是抗戰的主幹，也是建國的主力，可是他們的生活標準最受政府的剝削。

在以上所說的三種人中，若再加仔細分析，還有一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就在這三種人中，中上級的生活標準，降低的程度又較中下級為猛烈。農民中的自耕農，因為負擔的捐稅特別重，因之收入亦特別減少。我們若深入鄉間，一定會知道從前的小地主都在賣田渡日。公教人員的高薪階級，因為生活指數相等的關係，收入亦比例的更為減少。

在受政府統制的各種職業中，工人比較是受優待的。工人的待遇，大體上按照生活指數，說樂觀一些，他們都能維持戰前的標準。但那也不可一概而論，上海區以外的工人，事實上並不能按指數領工資。就是在上海區以內，好多單位的工人也在抱怨他們不幸的待遇。在生活指數中，住的支出恐怕沒有估計在內，但這一項是上海人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因此，生

活指數的正確性事實上是很可疑的。不過無論如何，在靠薪給過活的人士中，工人還算是天之驕子。

至於不受政府統制的那許多人——官僚資本家、豪門資本家以及投機的商人，收入却十倍一百倍於戰前。這一種人，無異受了政府的保護溺愛，把一切人省儉下來的統統收為己有，大部分人戰時所受的損失，就是這少數人的收入。

這種不平的現象我們倘無暇加以抱怨，我們要慎重研究這個現象所發生的結果。農民士兵以及公教人員，幾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他們生活標準的普遍削減，實等於降低大家的購買力。因之日常生活品的銷路就顯得非常停滯，我們現在尚沒有作家經濟學目的分析，但可以想像得到的，一般人的家用，已盡量節省各方面的支出，甚至衣食方面也不得不加以無限度的緊縮。在我們的印象之中，農民以及公教人員，添購衣服可以說都是在考慮之外了！除非有出生與死亡的情形，很難得走進布店的。其餘的各種支出，一概的認為奢侈品而無法享受。因為這種關係，製造普通日用品的工業，事實上已經到了無法復興的地步。

相反的，各種高級的奢侈品倒是有銷路的。少數暴富之徒，享受的慾望因經濟狀況的畸形發展而更形增加。進口的美貨，大體上都是屬於玻璃絲襪、玻璃皮包以及其他一般人所不敢想望的東西。我們常常以為政府對於進口的統制太不合理了，為什麼不把進口貨的品類限定於生產的工具。殊不知中國已變成了畸形的市場，必需品沒有銷路而奢侈品是有主顧的。商人在生意眼上打算，自然定購有銷路的商品。我們目下的酬報標準還是這樣繼續下去，這種不合理現象就無法停止，其最嚴重的結果，且使工業無由復興，經濟的組織無法健全；而所謂經濟危機祇有日益加重，決無改善的可能。

我們對於中產階級的崩潰當然深致同情的，但我們必須喚起大家對於這個事實作注意者，固不僅為了同情而已。我們深深感覺得這一種經濟階層的變動，實在是經濟無由復興的主因。

第三，我們覺得抗戰以後經濟上的變動是人口的向大都市集中。抗戰中間，這個趨勢業已造成，但為轟炸的威脅所限制，尚沒有高度的完成。抗戰結束以後，因為鄉村的不平衡，因為鄉村生活的艱難，因為在中共區

域中無法立足，人口的浪潮，更加速度的向都市集中。這是很好亦是很不好的變動。研究英國經濟史的人，都不會忽略人口集中為工業化條件之一。我們亦是在向這個方向前進，不是很可喜的麼？但是人口集中的都市，是否有這許多工業能吸收這樣廣大的人口？在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這種人口集中往往為發生廉價勞工的原因。現在我們對工資標準已有相當控制，這個危險可以不至發生。但是粥少僧多，失業的可能性依然是很大的。人口的集中，一方面說容易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而另一方面來說，鄉村中又感到缺少勞動的恐慌。現在我們人口的集中並不是很自然的。農業的

從歷史觀點看我國法治之前途

徐鑄

近年以來民主與法治之聲譽漸隆，關於此類之鴻文偉論，不斷刊出，蔚為盛事。竊以為欲實現民主政治，尤須首先養成守法之精神，法治為民主之靈魂，苟無法治，則雖有民主之名，實不啻一不具靈魂之軀殼。虛有其表而已。筆者不敏，欲從我國歷史觀點，探尋我國迄未進入法治之源，再從而針對現實，以求去病之方，一己之忱，如是而已。

考我數千年來，一貫為君主專制政體，在此種政體之下，君權高於一切，操最後決定之柄，故雖亦有法律之頒行，但並不能約束之，限制之，彼固可以一時之喜怒，一言而變更之推翻之，無所顧忌也。此種事例，信手拈來俯拾即是。例如我國歷朝所頒佈之法典，關於刑名一章，對於死刑多僅規定絞斬二種。（如唐律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等均如此）。然往往因君主一時意之所至，對於某種罪犯，則以凌遲處死（凌遲之法創於宋代）或夷其十族（如明成祖之於方孝孺）甚或死後戮屍，（如清雍正間之文字獄）凡此均為刑律所不載，而暴君各以己意出之者。在此種政體之下，其無法治之可言，固無足異也。再者我國思想界，數千年來，不出儒家學說之範疇，儒家倡言禮治，而藐視法治，以禮為本，以法為末，故有出於禮則入於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之說，且其最終之理想，在於「刑措而不用」，「刑期無刑」為鵠的。此種思想，在今日觀之，不僅有反

生產方式並沒有絲毫改進，因此農村對於勞動量的需要也並無改變。現在因為種種人為的壓迫，所以農民向都市流動，這各方面不會發生好的結果。

現在談經濟復員的人，我們認為必須面對這三種事實。我們並不是說這三者必須恢復舊態，而是說如何使三者不至阻撓當前的復員工作。戰前的各種經濟情形，我們並不以為是純自然秩序，所以也並沒有回復舊態的必要。但忽略這三種事實，却會對復員工作發生很不好的影響。

人民平等之原則，抑且忽視社會之環境，蓋人類為社會動物，人與人相處，不能無爭，有爭則不免有違反社會紀律之事發生，違反社會紀律，則不能無制裁，而制裁之對象，固不能因「大夫」與「庶人」而有別也。故儒家此種思想，雖反乎現代潮流，然以在昔專制政體之下，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再則統治階級則又借之以維持其地位於不墜，蓋以其有利於己也。

再考我國有一短時期，亦曾實行嚴格法治，而且收效甚洪，此則在春秋戰國之世，法家輩出，著書游說，鼓吹不遺餘力，其在秦國，一度由法家商鞅掌握政權厲行法治。今該舉韓非子之言於下「古秦之俗，君臣嚴法而服私，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尊顯也，故釋新法。民後之知有罪之必誅，故民莫犯」。以上見韓非子《姦劫弑臣篇》又據史記所載「孝公以衛鞅為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中略），令行於民，秦民之國都。初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戮其師公孫賈。明日秦民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以上見史記商君列傳。觀此可知秦國在變法前之政治腐敗狀況與乎商鞅行法之嚴正無私，不避權貴，以及法治

所收之效果，均可瞭然，是商鞅使秦轉弱為強之功偉矣。然法治之基，未可建於專制政體之上，故一至君王易位，時勢已移，其本人竟至不能保其首領，法治之光芒，有如曇花一現，足可為人在政舉，人亡政息之說明也。以後至於漢代，罷斥百家，獨尊儒術，視法家為刻薄寡恩，受人輕視，顯至士大夫恥於言法，而儒家之思想，又恢復其統治。在儒家之旨，固亦以濟國家於富強康樂為指歸，未可厚非也。然蚩蚩之民，豈均能知禮而不犯義，又歷代君王雖不乏賢明之主，然昏暴者實居大半數以上，故每多虐政使民不堪，又無嚴格之法律以限制其逞意適己之行為，此所以亂多於治，而無由進入法治之域，以迄於今，此其結縲之所在也。

據以上簡略之分析，可知在我國盛稱民主之今日，而言法治，仍不能不以古為鑑，從歷史所昭示之創痕，而求救弊之道，以筆者個人所見，謹提出數列各點。

(一) 法律頒布後應嚴格實行 中華民國成立迄今，已三十六年，在昔軍閥時代有法而不行，姑置勿論。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各種法律，次第頒行，已可謂燦然大備，且各種規定，類多採世界最新立法之例，或且過之，固不能謂非美備。(雖不無可議之處，然究屬小疵。)然法貴能依照實行，試觀我國現行法律，真正嚴格實行者有幾耶？如此狀況最易啓人民輕視法律之心，而以後再頒之法律，人亦將等量而齊觀之，此最可危懼者也。欲挽斯弊，惟有嚴格依法實行，其有違反之者，嚴格制裁之。而尤以全國各領袖人物，提倡守法之風，自身從極細微處做起，以為全民之率，以轉移風氣，振此頹習，相信收效必迅速而洪大也。

更有進者，有法而不能行，不僅使人民對法律存藐視之心，抑且將造成自由行動之結果。在法治國家人民不得以私人腕力執行正義，為不易之原則，人民苟有冤屈或法益被人侵害，均須訴之司法機關，以求申理。在有法而不能行之國家，如乞援於法律而無靈，或執法而不得其正，人民為怨憤所激盪，常發生置法律於不顧而自由行動以求伸雪；事實，此種惡劣現象實為法治國家所不應有，而且絕不能容許之。最近數月來，報紙所登載此類事件已有多起。會憶一二月前上海大公報著論標題為無法狀態分析頗詳實足發人深省也。

(二) 軍人守法 我國歷代軍人毀法亂紀跋扈恣睢之事，史不絕書。

降自民國成立以後，北洋軍閥之橫行，尤為史所未見，其遺風餘緒流至今日，並未根絕，實可痛心。蓋軍人若以特殊階級自視，似可不受法律之約束，則於法治前途實為莫大之障礙。抗戰勝利以還，人民對於軍人摧毀強寇之功勳，所表現景佩之情，隨處可見。然軍人之不肖者，仍多違法壞紀之行為。本年初間全國各地不斷發生軍人因欲無票觀戲，而致糾集搗毀娛樂場所。又有猥鄙之流藉軍人勢力為非作惡，軍人亦有不惜為他人之傀儡而墮毀軍譽者，殊堪惋惜。在此輩軍人以為抗戰功高，應受社會紀律以外之優待，且自以為縱有越軌行為，而握有武器，他人其奈我何。此種行徑在軍人整體而言，實為害羣之馬，羞辱同儕，在國法而言，則萬難容忍，而必須執行以繩者也。故法治之行，有待於軍人之自覺自愛者良多，且進而起示範之作用為民之表率也。

(三) 執法者應出以循道之精神執行法律 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必得執法者之鐵面無私，以實行之，方足顯法律之威嚴，使人毋敢蹈法網。我國積習，重視情面，且階級觀念，未盡泯除，而尤以對於權貴似有不敢撻其虎鬚之概，致有「姑拍蒼蠅」「不打老虎」之譏。按民主國家人民在法律上固無貴賤之分，而一律平等，憲法有明文，若法律之效力，祇及於平民，而不及於權貴，則何足以言法治。近嘗讀隋書刑法志敘齊武帝，因法之情形曰「武帝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作質，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進帝曰，陛下為法，急於姦宄，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帝於是思有以寬之」。觀此可知玩法壞紀，行法不平所肇生之禍亂矣。我國目前現象，對於權勢之犯罪者，甚少見檢舉，更少有違法懲治者，此在執法者，或因報鼠忌器，或為自身保全，而不敢有所舉動，敷衍寬縱，抱不得罪人之態度，長此以往，法治何由實現。故甚望法界能多出孤耿忠直之士，以衛道之精神，不顧一切私人利害與忌避，惟法是從，余相信其有裨於法治者，必非淺鮮也。

(四) 輿論界盡情揭露 報紙為民之喉舌，以探訪所得公之於世，其引人注意之力量極大。晚近報紙對於揭發發伏之新聞，較之往日已大見增多，實為一種良好現象。惟對此類新聞，於「道」之中，仍不免常用隱諱之詞以代之，果能暢所欲言，盡情披露，不獨使讀者可以明悉此中曲折，以

及犯者何人，抑且事既宣白，亦可使執法者不復能裝作不知，而必檢舉法辦，以平衆憤，故輿論之力實含督責之効。最近湖南邵陽專署官員劫殺事件，輿論之宣揚，盡情暴露，纖細不遺，已使遍國皆知，莫可隱諱。是以促起湖南省政府與中央之注意，致專員撤職入獄，受審公庭，可謂大快人心之舉，是報紙對此事之功，不可沒也。

法治之途長而且阻，本未可一蹴而幾，其中艱澁自不可免，然如何養成人人守法衛法之精神，則在一念之間而已，中國人民素號馴良，多不敢犯法，且多具有守法之美德，不難齊之。在此余不憚重覆言之者，厥為在上者，應多作示範之行動，則法之行必將如風吹草偃，而風氣立變。余相信作能如此，則我國躋入真正法治之途，其時間必可大為縮短也。

不許日人重到台灣

(台灣通訊)

(下)

憶琴

日本民族是個無賴的民族，他得勢的時候，能够狠狠的的殘害你，他失勢的時候，能够甜甜的奉承你。今天的仇人，明天可以是好友；明天的好友，後天可以翻臉不認人。我在台灣時接觸過上中下級的日本人，從教授一直到工役。現在他們是戰敗國投降了，那一種卑躬屈節的恭順樣兒，你真會被迷惑，覺得日本民族竟如此的溫良。(但是他們之中可說是人笑裏藏刀，沒有一個是懷善意的。)許多中國官員甚至美方將士，都被日本人的迎合工夫所擊倒，頗有認為日本人是溫和可親的人民。倘使日本人搬到台灣，對台灣人民也來這一套手段，你猜台灣人民的心理上會起怎樣的影響？

單是博得台人的好感，還沒有甚麼危險。危險是在日本人一到台灣，台灣省的一切工商經濟事業的實權，無形中會落入日本人的手裏，這個影響可不小了。我上面說過，台省的中上級技術人材大多是日人，現在台灣缺的就是這一些人材。我國的人材不夠，台灣本地的人材還未訓練出來，日本技術人材一到，必然補此空檔，逐漸掌握實權。尤其是台灣過去的工業，都依存於日本本土，一切設施和日本可以說不無相通，脈絡聯貫的，技術方面也是如此。我國專家所不能理解的，日本專家是知之有素。以他們駕輕就熟的知能來做競爭，不是說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他們可以無孔不入的與我國人材競爭)，究竟鹿死誰手，實在值得考慮。更可怕的是日本人的挑撥離間的鬼花樣極多，如果讓他們到了台灣，決非台灣與中國之福。在台灣新光復的時候，日本鬼子在美軍與台灣省政

當局之間已極盡其挑撥離間的能事。譬如伊文思的黃金案，就是在日本人的陰謀裏，使那位美軍中校上了貪污的大當，這不過是一個特出的例子。幸虧中美雙方的感情素洽，所以日人雖多方暗裏中傷，還沒有更大的亂子發生。後來美軍離開台灣，日人即變換對象，來挑撥台人與外省人的情感。台人比較的情短氣促，容易上當，這次「二二八暴動」的內在因素，日本人的挑撥之「功」，也是不可抹煞的，一位台灣同胞告訴我，日人會對台人如是宣傳：「中國軍隊是有槍沒有子彈的，即使有了子彈，中國兵也不懂得開槍的，你們儘管開好了！」當時暴徒燒官署殺官員之初，政府為顧惜民命，不准軍警開槍彈壓，台灣流氓誤信日本人的話是對的，於是益發猖狂，釀成大變，在事變當中，日本人是飲酒作樂，開心極了；還對在台的外省人表示同情，邀往他們的寓所避台灣暴徒的傷殺，(自然沒有人去理睬他們)。這是最高明的離間法呵！

我要說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是可怕的可憐的間諜，在台灣的特殊環境裏，如果讓他們大批的移民，這種可怕的可憐的間諜必然造成台灣極度的不安。台灣是個被日本佔領統治了五十年的地方，無論在人民的心理上，精神上，物質上，都要徹底將日人的統治痕跡掃除淨盡，完全中國化了以後，才可以和日本再度接觸，否則文化的情性，會使台灣的中中國化遲緩多少年，甚至根本變了質。

至少在五十年內，台灣應該絕對的排斥日本移民，不准日人踏上那片土地。在對日和約簽訂以後，縱使日人可在我國其他各省自由居住，而台灣省則在五十年以內，應該絕對例外。至於所謂特別移民權，更是萬萬放不得，這與台灣億萬年命運有關，決不能等閒視之。

民主政治與集權行政

章元鳳

今日是人民的世紀，民主是政治的主潮；可是民主政治，還要配合着集權的行政，方能「有能力」「有效率」的保證其成功。人民決定政治，政黨唯有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方能獲得政權；政黨必須顧到多數人民的利益，才可制定國策。國家的政策，一經確定，如何全力推動，如何有效施行，這是行政問題。行政專講效率，以責任與權力的適當支配，為其成功之基礎；責任須專一，權力要集中，這是政府另一種的功能，其作用在於執行國家已決定的政策，把它最經濟最有效的討論實施與推進，與政治趨向民主呈現着相反的趨向。舉個通俗的例，譬如建築房屋，要建怎樣的式樣，計劃經營，是工程師的責任，式樣一經決定，要待成百累千的工人根據圖樣，分工合作的營造。在營造的過程中，祇要工程不和圖樣有所出入，工程師或者說房屋的主人，不應該妨礙工作的進行。

經過八年殘酷戰爭的磨練，中國人民鍛鍊出自己的力量，大家都站起來，一致要求實行民主。各黨派間，各階層間，展開了廣泛的民主運動，掀起了高度的民主高潮，人民政治覺醒的加強，象徵着中國政治的進步。被治者較治者更為高明，有能力鑒別是非，看什麼值得擁護，看什麼需要反對，壓迫固所不受，欺騙又所不行，齊起要求，羣作反抗，這絕對不是危機而是進步。從古今的治亂興衰來看，治者與被治者的形態大抵不出四類：以無知領導無知，必成暴虐之政，如桀紂暴政；以無知領導知者，這是革命爆發之前奏，如清末的愚昧；以知者領導無知，這是獨裁，如明之洪武，也可能成爲開明的專制，如唐貞觀之治；以知者領導知者，這是民主政治的極致，是謂大同。中國人民現在一致起來，要求民主，爭取民主，中國正走着中國要走的道路，中國人民將用他們的生命和力量向這歷史的方面人民的方向上邁進！

違反民意的統治，是歷史上的陳跡，歷史前進的動力，是不能拉轉回頭的。這次反法西斯戰爭的光榮結束，已經告訴我們離開人民而圖統治是

不能繼續下去的。違反民意的獨裁，每易將國家與亡所繫的國策，憑着個人的好惡來決定，衆人的事，還要衆人來決定，決定的表現便是民意。所謂民意，並不是任何人，任何階級或者任何集團所能製造所能扮演的，其表現情形必須符合大多數人們的生存，其表現條件，必須在無任何勢力操縱下，才能成立。

民主就是訴諸民意，要以不民主的手段，而求達到民主的目的，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原來民主不單是政治上的一種表面現象，它是包括着社會的經濟的人民的整個生活形態，所謂「德謨克拉西」，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一種人與人間的相處之道，也就是一種做人的精神。任何國家或其人民倘使喪失了這種態度和精神，不管政治的形式是如何的表現着民主的作法，終究是變和民主的本來旨趣背道而馳的。民主的基本精神概括說來，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訴諸理而不訴諸力，第二是本于法而不本于情。前者是說，各種問題各人皆有各人的看法。民主政治，是以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人的行爲爲依據的。要求得大多數人的同意，只好各人強調自己的主張，以理去折服他人，而不以力去壓倒他人。任何一種意見在未作最後決定之前，各人要多發揮自己的主張和道理，以取得別人的同情和擁護。民主精神要容納異己，不以任何力量去壓倒不同意于自己的人，要使人民了解國事，了解什麼是於大眾有益的事，然後能對大眾有益的事，立下合法的判斷，獲得完滿的結論。第二點所謂本於法而不於情，因爲民主政治是與法治主義不相分離的，無論那一個人在法律之下，都是一律平等，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由法律來保障，人民的義務，也由法律來規定，上下一律，奉公守法，不徇私情，治者只知道爲了人民，而人民只知道爲了國家，惟能如是，民主政治才有光明的前途。

我們生存在這一個偏私固執入主出奴而又巧於宣傳的世界裏，每一方面都在作引誘性的自我宣傳，我們若是一不小心，便將成爲一種精神的奴

錄。實踐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還是要人民能够保持清白的意識，不為一時的假是假非所混淆，在是非真假之間，看得清拿得穩，不作虛聲，不為人所利用，而自有其真實的見解和不屈不撓之處，以最大的堅定精神，來應付現實開拓未來。整個的世界，從毀滅中拯救了出來，民主政治的新中國，應以過去為鑒，以世界為鑒。過去的世界和現在的界都值得我們去重視和趨避。

民主政治在歐美國家每和資本主義混合，結果形成為財閥壟斷下的寡頭政治現象，民主政治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每不易實現。中國的民主前途，當以歐美各國為前車之鑒，先在改造經濟上下一番功夫，如果不能根本取消經濟上的不平等，至少要改創大富與極貧的懸殊；否則不免甘蹈歐美的覆轍，在政治形式上，成為空頭民主，在社會經濟上，成為寡頭專制，自由平等，一切都是空話。

實行民主，須要每個人民能够尊重自己，了解其本身實處政治主人的地位，治者不過為被治者的工具，他們須以人民之目的為目的，而不以其自己之目的為目的。惟人民才有權力，人民須絕對不受治者的威脅利誘，不肯做出違背良知的論調或行為；否則人民為政黨所利用，為政黨所操縱，祇見政黨的利益，而無人民的利益。政黨各自喊着「為的是人民」，實際上不過人民為的是政黨。

從事政治須有先知先覺的發明家，真正了解人民的要求，制出吻合民意的政綱，腳踏實地的為人民謀利益，他們是否能够成功，以是否能爭取民意把握人民為標準。可是担任行政工作的人們，不需要先知先覺的發明家，而却需要後知後覺的宣傳家，他們是否能够成功，以是否能推行國策實施方案為標準。在完成國家目的的過程中，政治家實處於主動的地位，而行政家僅處於被動的地位。政治家的權力，從來源上說，是人民賦予的委託的，他們獲得了這種權力，制國策，訂成方案，再將所得的權力，轉遞於行政家，行政家獲得了這種權力，推行既定的國策，實施已決的方案，而其行使權力的目的，也只有為了人民的利益，吻合人民的要求。

由於干涉主義的興起，由於社會經濟的變遷，時至今日，各國政府隨着世界大勢，政務一天一天的加多，政府的行動也一天一天的擴大。在西洋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學術思想的新勢力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的統治階層

以為他們有廣博歷史的智識和修養，大足對付老殘遊記裏說的那些只知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的人民。現在可不同了，現在的行政家需要豐富的知識，專門的學養，明銳的觀察，高遠的品格和果毅的精神。以前的政府僅僅管理一些司法軍事和民政，現在的政府不但要管理司法、軍事和民政，還要管理教育、衛生、郵政、交通、經濟、和公共事業社會福利。許多事以前是人民自己的事，現在都要由國家出來統制。政府行動範圍一天一天的擴大，行政效率自必一天一天的增加。要行政效率增加，人民自應信任政府在執行國家決策的過程中，作大刀闊斧的積極行動來保證其成功。蘇聯政府每次推行鉅大驚人的經濟計劃時，舉凡經濟上的生產分配和交易，都受政府的指導和統制，發動萬鈞雷霆的力量，集中目的前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中國政府若要完成建國大業，要應付目下的經濟鉅變，決非各自為政，牽制掣肘的行動所能奏效，唯有健全的、集權的、有效的、有能的政府方能担此重任。在現在來談行政集權決不是偶然的！

我國有一句古語：「人存政舉，人亡政熄。」這是偏重個人而忽視制度，偏重主觀而忽略客觀，偏重倫理而漠視法治。講授官就說「清白乃心」，講服務就說「公而忘私」。不從制度方面，使其不能不清不白，使其不能不公而忘私，而專靠個人的主觀心理作用，此所以公而忘私的百不得一，不清不白的比比皆是了！恃人而不恃法，實心而不言制，其結果必然如是。所以政治上，人固重要，法更重要，而健全的權力分配，尤更重要。人與法的調和，乃行政上的初步條件，惟有配合健全的權力分配才能談得上行政效率。

究竟健全的行政權力應如何分配呢？行政權力的分配須作由下而上的轉移，由縣政府而至於省，由省而至於中央，使上級政府的行政權力日趨擴大，使下級政府的原有權力集中中央，使中央對下級政府的行動能為更嚴格的監督與指揮；良以社會經濟日趨發展，社會交通日趨便利，一切工商事業及經濟活動，都漸次衝破地方界限而變為全國性，若不由中央政府通盤籌劃，作整個的處置，將得不到圓滿的結果。再從橫面的關係說，中央政府的各部門，與省政府的各廳間，要有密切和諧的關係，統一事權，迅速指揮。這種有力有效的措施決非責任不明，行動不嚴的會議制所能奏效。孟德斯鳩的以權制權的制衡原理，率制過多運用不靈，已遭現代所唾棄。既定政策的執行機關，應採首長制而揚棄會議制，的僅值得作詳盡的考慮。

談原則還要談辦法，願理想還得願現實，重政治還要重行政，願當前一般政治學者，於斤斤研究理論之餘，對國家既定政策，如何能迅速的、有效的、經濟的、順利的推行，也得作一番明晰的研討。

中國也逞掉閻縱橫之術？

林學洪

五億美元的美國對華借款，因為中國不能適合貸款條件，談判久久不能成功。這幾個星期之中，外蒙軍隊窺犯北塔山，蒙匪侵擾察北，關內外共軍大舉反攻，警報接二連三的傳來，一時對內外局勢緊急非凡，使得美國方面的財政援助尤其軍火的繼續接濟成爲中國政府最迫切的需要。在這個當口，政府從孫副主席的口中發出一「美國是否要放棄中國」的呼聲，要求美國重新表明對華態度。

中國目前急切需要美國的信用援助，以解除現時感受到的軍事與財政危機的嚴重壓迫，這是實情；在經濟上既不能適合貸款的條件，自然惟有根據政治上的理由請求救援。要達到這一層目的，中國政府就利用美國人恐共的歇斯理亞，指出共產主義威脅的嚴重，強調中國內戰的國際性，意思說，假如美國繼續保持馬歇爾離華聲明發表以來的中立觀望態度，那就無異放棄中國，把中國交給魔鬼。所以，杜魯門主義必須馬上適用於中國，中國需要它，歡迎它。

最近有一二軍事長官公開聲明中國的「內亂」已漸漸轉入國際性的戰爭；談大問題交涉年餘不得結果，外交部却在這個緊急關頭才率直發表；由孫副主席這樣地位的人物第一次對外公開譴責蘇聯的違約祖共，並且明白主張應使日本成爲防共的緩衝國，這一切似乎都在表示中國政府已經準備重新考慮對蘇關係，只要美國方面有堅決的表示。

這可以說三月間莫斯科外長會議以來的一個重要的改變。在那個會議舉行的前後，中國一般反對莫斯科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人曾經盡可能的否認中國內戰的國際意義，時至今日，局勢一變，他們又開始強調中國「內亂」的國際性。一年前不樂意承認中國是東方的希臘的人，自從杜魯門主義出現以後，就有許多極力設法使美國的國務部相信中國和希土情形沒有兩樣，需要軍事的接濟更甚於需要經濟的協助。

蘇聯不能履行盟約的規定，我們容忍了一年多，今天因爲兵家常有的勝敗而突然感情爆發，向美國——不是聯合國——提出申訴，在時機上說，未免失之太早。我們扯起反國際共產的大旗向美國乞援這是何等不祥的信號。美國的反響如何？他們還沒把握，先就擴大了中蘇的惡感，這豈是明智的舉動？中美和蘇聯的關係假如繼續惡化，首先遭到不利的不消說是中

國，首先享受利益的不是美國，也不是蘇聯，却是日本。日本是否適宜於做防共的緩衝國，第二次大戰中所領受的教訓應當還很新鮮，但是對日戰爭結束不到兩年光陰偏就有許多人把日本當做活寶似的看待。這表示我們畏懼共產主義更甚於法西斯侵略。

美國的反響又怎樣呢？十天以來的表示也真冷淡得可以。渴望半年的五億借款到底還是不給。上星期大美晚報的一篇社評會指出中國這種「虛聲恫嚇」未必就會奏效，它「不能使得美國發生什麼印象」。事實上，美國有美國的算盤，他的經濟援助自然要往最有利的地方投放，除非他的力量沒有限制，不能對一切願意反共的國家做無保留的施捨。美國放棄中國，放棄國民政府，自然還不至於，不過美國的軍人既然那麼看得起日本，美國今後對中國的援助只怕更要來得有條件。

強國的行徑像匪徒，小國的行徑像妓女，這是一切國際戰爭的外交原因，中國原本是個大國，不幸受了連年內戰的累變成了一等弱國。當着這個國際風雲緊急的時會，對於外交問題的處理更應當加倍的慎重將事，稍有失當，後果就是不堪設想。東北如果真正成了第三次世界的火藥庫，絕對不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弱國的外交惟一聰明的政策是獨立而不孤立。國際上的友人是把不定的，敵人却是一成不假。多了一個國際敵人，就要增加對於另一強國的依賴性。結果離不了悲慘。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今日之計，惟有從內政的修明實現外交的安全才是真正辦法。弱大國家的外侮都是由不斷的內訌召來的。如其利用國際勢力的衝突以解決國內的政爭，不如一齊放下屠刀共謀團結以消弭大戰的危機。

第二大戰結束以後最令人不解的事就是中國人談起再一次的世界大戰時的那種不在乎的神氣。我們對付一個共產黨有時還不免槍法紊亂心中着慌，還有什麼資格侈談第三次世界大戰？

伍憲子先生的話說得很對，中國在「外交方面仍當切實聲明，保持永久中立地位，對世界列強，絕不存親此敵彼之心，絕不退掉閻縱橫之術」。中國目前還不是逞掉閻縱橫之術的時候。

大華貿易行

經營國內進出口及運輸業務

地址 四川南路壹號

電話 八七九〇一

分公司

香港 天津 青島

國內電報掛號 〇五六一

國際電報掛號 TSUANWU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四、譯稿須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未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需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民主論壇週刊

第一卷 第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二千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五六二

上海總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南京總經售處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一號之一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電話：三七三〇

本刊登記手續尚在辦理中

聚興誠銀行

便利
人羣

服務
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經營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 通匯地點 ▶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昆明 貴陽
長沙 常德 重慶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遂寧 內江 自流井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機器廠——供應各式機件
麵粉廠——供應麵粉

地址：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2878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電報掛號 0195 或 Shanghai yungchung

國外分公司：紐約 香港

國外代表：倫敦 印度

義豐錢莊

交款迅速 手續簡便

營業項目

一 存款 二 放款 三 匯兌 四 貼現 五 代理收匯 六 押匯 七 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上海分莊：

地址：南波路二二二號
電話：九三九四三三號
電報掛號：二一三二號
重慶總莊：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電報掛號：四四一六號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九九三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一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
電話 (〇二) 六二〇五七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一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五〇